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语言地理

〔法〕罗朗·布洛东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语 言 地 理

〔法〕 罗朗·布洛东 著

祖 培 唐 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地理/(法)布洛东(Breton, R.)著;祖培,唐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909-0

I. 语… II. ①布…②祖…③唐… III. 地理语言学
IV. H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311 号

我知道什么?

语 言 地 理

[法] 罗朗·布洛东 著

祖 培 唐 珍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ISBN 7-100-02909-0/K·616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¼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难免有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部分 语言地理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地理语言学与语言地理	3
I. 地理语言学——语言学家的工作	3
II. 研究“语言地理”——人文地理的 分支	21
第二章 语言, 种族特征	33
I. 个体语言和群体语言	33
II. 语言与其它种族特征的关系	38
III. 种族或种族语言群体	48
第三章 语言的力学	64
I. 发展和传播的阶段	64
II. 语言的生与死	69
III. 语言在地域上的分布	76

第四章	语言地理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95
I.	量化的必要性	95
II.	图解描述	102

第二部分 目前语言的分布状况

第五章	世界上的语族和文字	110
I.	目前世界上的语族	110
II.	文字的分布	123
第六章	语言的洲际和国家分布	126
I.	欧洲	126
II.	阿拉伯语和闪米特语区	132
III.	亚洲和大洋洲	133
IV.	美洲	142
V.	黑非洲和印度洋诸岛	146
第七章	世界上的语言状况	151
I.	语言、种族集团的不平衡	151
II.	国际性语言	155
结束语		161
注释		163

参考文献.....	168
插图目录.....	170

引 言

这是一部地理学而不是语言学的专著。正如人们有对社会语言学和人口语言学的说法一样,撰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开拓被称作地理语言学的中间地带。然而这部由地理学家完成的著作未能触及语言学的内在部分——即语言现象(如语音、词汇、语法等)以及语言现象空间分布——这些问题有待于语言学家去分析,可以通向地理语言学或称地理方言学的研究。地理学家从语言学家的综合出发,面对各种语言,或称方言、土语、克里奥尔语等,将这些语言当作社会群体现象来思索,因此只涉及外在语言学的表面地带,即方言,并视其为全部,以便考察这些地区的社会和空间环境。

与地理语言学不同的是,语言地理首先被分解成普通地理学研究,然后步入区域地理研究。

首先被确定的研究目标是语言。它是每个种族的人的基本特征和连结各群体之间的纽带。在社会中,方言在时空上的多样性反映出一种力学关系,地

理学研究有助于界定和解释这一点。勾勒出语言生态对文化地理和思想地理都大有助益。这项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语言现象及其与其它社会特征关联的考察的基础上。

纵观幅员辽阔的各大陆和次大陆,以及几个大国的语言分布状况,虽然可以描述这些语言的区域地理,可是由于缺乏可靠严密的依据,还难以绘成地图。然而这项研究已经确立了一定地位,因为这仅仅十几种语言就凝集了世界上 60% 以上的人口,他们以此为母语,更多的人以此为文化语言。

第一部分

语言地理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地理语言学 与语言地理

I. 地理语言学——语言学家的工作

1. 内在语言学——对语言本身事实的研究

作为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语言被分解成在两层重叠关联中同一代码上的成分:

——被称为“第一层关联”上的成分包括:语素,包含词汇语素或称词素在内的最小意义单位,它们属于词汇体系(含名词词素或动词词素);还有符素,又称非词汇语素,它们构成诸如前缀、后缀等语法单位。词素和符素结合组成词汇单位或称词。

——被称为“第二层关联”上的成分包括:音位,

即在每一种语言中形成的语音单位,它们是由以特定的方式发出的,一定数量的特殊⁽¹⁾元音和辅音,即准确的发音点,它们符合习俗,由环境习得,因此这些音位使用一些确定的发音部位,用特定方式改变口形,同时识别别人的发音。

这些音位可以依据书写通过一定数量的不同的书写符号或者称字素表现出来,它们程度不同地忠实于或者说与音位一致:字母带有或不带区别意义的符号、重音等。这些书写文字被称作标音文字,我们的字母表就是一例。还有一些文字利用字符表现词汇或概念,我们称其为表意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汉语的方块字为我们提供了最鲜明的例证。然而大部分表意文字发生了演变,过渡成为一种被称作形符文字的形式。形符文字将词汇和发音结合成一体表现出来,给人的印象是表现完成“字谜”的过程。

语言学家从与他的学科各个部分相符的角度分析语言。

——语音学。对各种语言的发声进行物理和生理描述。

——音位学。从语言学对声音现象进行贴切的研究,就是说对每种语言的音位进行研究。

——形态学。对语素和词汇的结构进行研究。

——句法学。对句子和话语中的意群或词群进行分析。

——语义学。分析表意过程,或物(即所指)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即语义上区别特征或称语义符号和较为复杂的词群或称语义单位(义素)。

——文体学。研究有意或无意,个人的或集体的,独特的或平淡的语式。并研究话语以便弄清内涵的丰富程度和所传递信息的美学价值。

语言学各个途径之中,似乎通过形态学我们可达到最有意义的区别各种语言和分门别类的目的。施莱格尔兄弟,弗雷德里克(1772—1829)和奥古斯特(1767—1845)从比较系统的形态出发,最先对语言类型进行划分。语言就此被分为三大类别:

——单音节语言(孤立语)。这种语言由很短的、独立的变化不多的词汇组成,其词序在句子中占有重要位置。

——粘着语。其中的词素由一个个实体拼凑聚合而成。

——屈折语。在这种语言里,词根或称词干的变化,通过元音和辅音的交替变化,添加词缀和词尾产生词意的各种变化。

现在还应补充说明如何区别外部屈折语言(其中以词缀和词尾的变化为主)和内部屈折语言(其中以元音和辅音的变化为主)。然而人们更喜欢称那些用词素集合产生新的词汇单位的语言为多式综合语;而把那些词素相对独立、变化少而且短的语言称为孤立语。屈折,多式综合(或粘合而成)的和孤立的三个形态变化系统的语言在许多语言里关系紧密。事实上这表现出词汇整合所采用的各种倾向,从屈折(最容易整合的形式)到孤立形式(最不容易整合的形式),中间形式多式综合。每种语言及其每个阶段的演变都突出表现出一两种趋势,诸如汉语纳入多式综合和孤立形式,拉丁语接纳多式综合和词形变化,英语和法语的孤立过程和芬兰语的多式综合形式。

很显然,语言形态变化的任何相似之处都不足以揭示它们的亲属关系,但却表明了一种类似的处境或演变。语言学家发现了形态学、音位学和句法学意义上的演变的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即使对同族语来说也不是普遍的固有的,它们不同程度地根据人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和历史制约了每种语言的法则。英语的例子在这方面特别对我们有教益。A. 梅耶在他的著作《新欧洲的诸语言》(第 96 页)里显示出英语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他在回顾了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迅速变化直至诺曼底被征服的历史后说道:

“各种变化的倾向都各行其是。当高居孤立地位的贵族阶层终于接纳了地方语言,而英语又重新成为大众语言时,传统倾向导致的演变得以实现。英语因而进入了稳固局面。然而它已不同于日耳曼共同语,更不像印欧语,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民族语。

已经与印欧语发音截然不同的日耳曼共同语由独特的音位系统取代。在语法上,已经比印欧语极其复杂的语法现象简化了的日耳曼共同语被替换成一种词形变化几乎不起作用的语法。日耳曼共同语继续了印欧语,英语继承了日耳曼共同语。然而,英语的发音系统却已经和印欧语的发音系统没有共同之处,成了不知哪个语系的哪个社会的语言。而英语的语法更像汉语或苏丹的某一种语言,而与印欧语不同。尽管英语动词里留下一些古老痕迹,是印欧语群中最简单又最现代的特征,然而英语从历史意义上是一种印欧语,在现代意义上却不是这样。”

语言学从索绪尔(1857—1913)开始明确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划分,历时性研究考虑一种语言在过去的演变,共时性研究则把语言状况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放到一个确定瞬间中去考虑。对语言的这两种着眼点——演变或静止的——自然是相互补充的。

通过这两个研究领域得以揭示出语言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往往与语言不同来源的各个层次相符,

表现为:

底层。反映一种过时的并已消失的语言,然而它的影响还反映在语言的某些词汇和语音的一些侧面上。例如法语中克尔特语的基础层解释了法语和加拉伊科—葡萄牙语中尚存的清鼻音——an, in, on, un。在布列塔尼语中也可发现这些发音。

上层。当一种语言明显被另一种不属于同族语却影响力强然而又不可能被替代的语言左右时的情况。如英语里的法语上层控制,达罗毗荼语中的梵语上层控制。

表层。当一种语言从相邻国家语言中大规模借词的情况。如德语、俄语、瑞典语等语言里使用法语借词。反之,从十八世纪起法语使用上述几种借词以及十六世纪就开始借用的意大利语和二十世纪借用英语词语构成的法语单词(le “franglais”)。

语言中词汇的变化从斯瓦德施(Swadesh, 1909)起通过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ie)或词汇统计学(lexicostatistique)来计算。犹如碳 14(同位素)的残留量可以测定有机物质残留的时间,在一种语言里一个时期内所使用的表明简单和基础概念的词汇(能从中列出 100 至 200 个就够了)可以通过词源测定那种语言与母语相隔的年代。这个“保留量”可以通过明确的计算表示出来。如从普劳特的拉丁语(公元前 200

年)到莫里哀的法语保留词汇为 79%,从古典拉丁语(公元前 50 年)到现代意大利语的词汇保留量为 85%,从这种古拉丁语到现代罗曼语的保留量为 77%,从中古埃及语(公元前 2000 年)到科普特语(公元 500 年)为 76%。对两种现代话语里的共同词汇进行比较还可以测定出他们的接近之处。照斯瓦德施的理论可以确认,只要拿出 100—81% 的近似词(同源词),就可以测出这是出自同一个语言的两种方言。有 80—30% 这样的词汇证明这两种语言是同族语,有 30—12% 的词汇揭示两种语言属于同一根源。随着比例缩小可以推算同“门类”词汇的共同处。如: 12—4% 属于“小门类”,4—1% 属于“中门类”,而不到 1% 则属于“大门类”……(见图 9)。

在语言年代学没有出现以前,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是通过施莱格尔(Schleicher, 1821—1868)的系谱树理论(stammbaumtheorie)表现的。这种理论借助自然科学,利用这种简单易懂的画面,可以从语言的外部环境将其繁衍的情况显示出来。以后,由于词汇之间的类比情况存在争议,存留了不少类似“母语”、“姊妹语”、“同族语”以及语言“干”“枝”和“分支”的说法。运用语言亲缘和血统的概念,语言学家取代了诸如形式演变、言语的继续,共同成分等说法。J. 史密德特